

潮声激荡，唱响不屈的战歌

新四军首创海上武装 日伪军难敌黄海蛟龙

重返
战地

抗战
史话

创建海防部队,是新四军在苏中的一次创举。粟裕、陶勇等创建的新四军苏中军区海防部队突破日伪严密封锁,打通了海上交通线,为争取战斗机机动性、拓展战略空间发挥了积极作用。南通、如东也因此成为人民海军的发源地之一。

“这是我们创建的第一支土海军”

新四军东进通如海启后,面临着陆上日伪分割封锁、上海匪横行霸道的双重困难。1941年至1942年,日伪军加强了对苏中地区的“扫荡”,根据地的形势愈发严峻。

为了转化背海作战的劣势,开展海上武装建设势在必行。新四军一师师长兼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在实地考察后设想用木帆船建立自己的海上武装。1941年春,粟裕抽调200多人建立了一支直属一师和苏中区的海防大队。1942年11月,粟裕等一师领导人到达何家灶,宣布以海防大队为基础,再抽调3个步兵连,配重机枪6挺,正式组建苏中军区海防团,三旅旅长、四分区副司令员陶勇兼任海防团团长。粟裕说:“我们创建的是中国人民的第一支土海军,你们来干,一定要干好!”

苏中军区海防团以盐渔民为基础,收编了孙二富、陆洲舫等原海匪武装,壮大了海上抗日队伍。孙二富第二次投奔新四军后改名孙仲明,意为“重见光明”。1943年11月,苏中军区海防纵队在何家灶正式成立,陶勇兼任海防纵队司令员,纵队下设3个海防团,达到了战船过百、战士千余的规模。

日媒惊呼新四军水兵“神出鬼没”

海防部队初建时,士兵们由步兵改为水兵,生活不习惯。粟裕鼓励战士们向当地渔民学习,尽快适应海上战争环境,他把探索研究的海上潮汐变化的规律编成小册子,印发到连队。

海防团指战员在木船两侧船舷加装几块钢板,在船头船尾摆上几袋沙包,再架上机枪和迫击炮,硬是将一条条木船改造成简易“军舰”。为解决海上指挥和联络问题,海防团想出许多行之有效的“土办法”,如用不同颜色的旗子,挂大桅、船头或船尾以表示不同的指挥讯号。夜间行动时,海防团改用手电筒、火把和花炮。这种原始的联络方式,日军一来无法侦听,二来看得云里雾里,反而大显神通。

在日伪全面开展“清乡”的非常时期,海防部队积极配合陆上斗争,先后与日伪军进行数十次战斗。1943年10月底,在陶勇的支持下,孙仲明率部实施陆海配合战术,把从海上进犯丰利镇的敌人吸引到预定水域,当日军船只触到暗桩不能行驶时,埋伏在岸边的新四军战士和民兵一起开火。经过数日围攻,最终将日伪军彻底击垮。

1944年春汛,驻江南浏河的新四军仲炳贤部派出36条船到吕四渔场抢渔船。海防纵队3个团32条船,加上渔民自卫队8条船投入战斗,击沉敌船一条,打坏敌船两条,击退日军舰艇两艘,敌船队在遭到重创后逃离。这是海防纵队成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1944年10月,陆洲舫率海防第3团去琼港,在途中主动攻击日军2艘运输船,活捉日军11人,得到苏中军区传令嘉奖。日本《朝日新闻》惊呼:“华东沿海从连云港到上海,有游弋不定的新四军水兵。”

斩不断摧不垮的海上生命线

苏中海防部队在敌人严密封锁下建起的海上交通线,保障了苏中、苏北至浙江、山东等地区间的联络与运输。

在日伪疯狂“清剿”“扫荡”的紧急时刻,海防团奉命从各港口征用了四五十条渔船,集中到何家灶分组编队,将兵工厂、被服厂、医药库、印钞厂、印刷厂等后勤部门的设备、物资全部装上车。海防纵队护送船队在海上航行六七天,安全到达盐阜根据地。

1943年,江淮银行印钞厂从苏北转移经型脚踏圆盘印刷机到苏中四分区何家灶印刷江淮币,情况紧张时登船下海,海防团护航在琼港、苞斗山、苦水洋、王港闸等几百里的黄海海面上游击作业,完成30万江淮币印刷任务。

除了运送物资,苏中海防部队还护送北上延安、南下敌占区上海的干部、知识青年、技术人员等百余批。在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中,滔滔黄海成为抗日军民的可靠后方。

·施菊 王颖 周磊·

沿着如东县长沙镇的海防线前行,车抵卫海村北首。驶过乡间小路,抬眼北望,一座红瓦黄墙的庙宇静默如磐——这便是三官殿。“这座庙就是苏中军区海防团的诞生地。”如东县长沙镇卫海村党总支书记周永军介绍道。

“2007年,三官殿变成危房,为了铭记新四军第一支海上武装与日寇斗智斗勇的传奇故事,本地渔民自发募捐5万多元,在原址上垒起一砖一瓦……”在南通市新四军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南通市党史理论宣讲团成员顾瑞芳的带领下,我们缓步踏入三官殿。抚摸着斑驳的砖墙,她的讲述也仿佛将我们带回了那段烽火岁月。

1941年初的苏中大地,硝烟弥漫。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粟裕率第一师转战江海平原。

如东地处黄海之滨,与日本隔海远眺,历来为抗倭要塞。“粟裕提出,如果在陆上立不住,就得到海上去打游击,把沿海一线控制在我们手上。”顾瑞芳为我们慢慢勾勒出了历史的轮廓:那时,江海平原无险可守、日军扫荡步步紧逼,唯有向海求生——建立海上抗日根据地。

何家灶(今卫海村)位于苏中沿海要冲,因易守难攻的地势和深厚的盐民革命基础,便成了海上根据地的天然堡垒。“你们看,原来这里有上百个盐墩和潮墩,潮

涨时一片汪洋,退潮时港汊纵横,日军的舰艇容易搁浅,反而适合简陋轻便的木帆船航行作战。”顾瑞芳介绍。

自此,海上武装力量的建设紧锣密鼓。1941年3月,粟裕抽调200多名精兵强将,组成一支苏中海防大队;1942年11月,由海防大队扩编而成的苏中军区海防团在何家灶宣布成立,这是历史上第一支“土海军”;1943年11月,苏中军区海防纵队正式成立,下设3个海防团。

村民们回忆,以前三官殿是渔民烧香祈求海龙王保平安的地方,后来海防纵队的司令部驻扎于此,各团部则散驻在何家灶的盐墩人家。这支拥有“咸菜瓢儿”等200多条木帆船的海上武装,打通了一条坚不可摧的海上运输线,多次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

“当年,盘踞如东的日伪军,经常隔三岔五在海上开着汽艇或皮划子耀武扬威,我们的土舰队在近海浅滩灵活穿梭,日伪的洋海军对此也无可奈何……”这支“土海军”的传奇故事,在顾瑞芳的讲述中活灵活现了起来,“有一次,人称‘活海图’的孙二富遇到10多条海匪船,他将对方的船从浅水引向深水,又从深水引向活沙浅滩,几个回合下来,海匪们就晕头转向,最后缴获匪船一条,并将船上10多名海匪当场枪决。”

在烟波浩渺的大海上打仗,不同于一马平川的陆地:四顾茫茫,看似处处是路,实则路路不通。

“何家灶的老百姓功不可没!”在三官殿遗址不远处,我们见到了卫海村仅存的一个盐墩,“那时候,盐墩家家户户敞开大

开创人民军队海上建军的先河

党史理论宣讲团成员顾瑞芳看来,研究海上抗日根据地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价值。

历史上,何家灶海上抗日根据地不仅开辟了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保障了战略物资运输与联络;组织渔民武装,保护其利益并巩固苏中海防;还在反“清乡”斗争中有效打破敌人的军事行动和经济封锁,有力支援了陆上斗争。

“尤其重要的是,”顾瑞芳强调,“根据地清除了海匪,击败了日伪势力,掌握了



何家灶三官殿

门让海防团战士宿营。有些经验丰富的老渔民、船老大,手把手教导战士们划桨、游泳、掌舵、上下船,还组织起牛车协会,从五六里外拖着大木桶,为部队运送宝贵的淡水。”顾瑞芳动情地说。

在这里,战士们拜渔民为师,在颠簸中锤炼海上本领:以汽车内胎作救生圈,用咸菜坛储淡水,他们吹海风、顶恶浪,战海匪、斗日伪,越战士气越旺,越战队伍越壮大。

在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资料陈列馆,一艘木帆船模型格外显眼。馆内工作人员介绍,这是照着当年新四军海防团的船只仿制的。

“当时,面对敌伪的加紧扫荡,海防团战士们正是驾驶着这样的木帆船,不仅将兵工厂、野战医院、药库、印钞厂、印刷厂等后勤机关的物资悉数转移到海上,还打通了苏中与苏北、浙江与山东的南北交通。”据统计,1942至1945年间,海防团共装卸军工材料、机械设备、医药、通信器材等敌人禁运物资80余船、近3000吨,在烽

火中织就了一条贯穿山东至浙东的“海上生命线”。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抗战胜利后,苏中军区海防纵队改编为华中海防纵队,参加了苏中七战七捷、淮海战役、渡江战役。1949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在泰州白马庙宣告成立,海防纵队的1403名官兵整编为海军第一纵队——粟裕当年在黄海滩涂上播下的海上抗战火种,终成共和国海军的参天大树。

江海交汇处,浪潮跨越时空、奔涌不息。如今,当海风掠过三官殿,咸腥中已注入新的气息:向远处眺望,蓝天白云下,一座座大风车迎风飞旋,LNG储罐群昂然挺立,千亿级临港产业集群加速崛起……昔日不畏强敌、“敢叫木帆船闯深海”的“土海军”精神,如今激励着如东通信、电力、海洋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深蓝舰队”,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大局中破浪前行。向海图强的梦想,也被写进每个赶海者的心里……

本报记者 王颖 施菊

专家
解读

“何家灶海上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是我党、我军在抗日斗争中的一个新创举,是把毛泽东军事思想与江海平原抗日斗争的实际相结合运用的产物,是科学地、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结晶。”在南通市新四军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南通市

采访
手记

1944年春汛,吕四渔场。一场激战后,海防纵队的木帆船满载弹丸,却高扬着胜利的旗帜凯旋。将士们豪迈的歌声——《我们是中国未来的新海军》响彻海天。何家灶海滩上,司令员陶勇亲自迎接归来的勇士,定格下一张承载着沉重与荣光的历史照片。

我们对顾瑞芳老师的采访,也是从她珍藏的这张老照片开始谈起。

在她娓娓道来的叙述中,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细节鲜活了起来。我们仿佛穿越时空看到海防部队指战员驾驶着简陋的木帆船,用各种“土办法”在茫茫黄海上与日伪军战斗,打破敌人的重重封锁。

采访过程中,顾瑞芳一直谦称自己是研究苏中军区海防团的“土专家”。然而,在众多受访者和党史研究者眼

中,她正是发掘这段历史、确认海防团诞生地的第一人。

50年前的惊鸿一瞥,让顾瑞芳的人生轨迹多了一抹“红色”。当还是小学老师的顾瑞芳第一次在何家灶村三官殿前看见那抹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历史的回响便在心底轰然作响。她翻阅大量的历史书和档案资料,却始终找不到关于“何家灶”“海防团”的只言片语。于是教学之余,她开始着手考证海防团的历史。

功夫不负有心人,数十年如一日的执着与坚守,让这段几乎被岁月掩埋的历史脉络逐渐清晰:当她在耕茶镇找到苏中军区海防纵队副参谋长孙仲明的警卫员黄新,辗转多时终于联系上海防团老战士时,那些尘封的战斗记忆如潮水般涌来;当她从海防二团政委柴如奎遗孀手中接过那张珍贵的合影,吕四渔场保卫战的烽烟也仿佛穿越时空、跃然眼前……这些散落的历史碎片,在她手

中渐渐拼凑出完整的海上抗战图景。

如今,年逾古稀的顾瑞芳依然步履不停。她带着史料走进校园课堂,在党政机关的讲台上动情讲述,笔耕不辍地撰写学术文章。这位白发苍苍的“历史摆渡人”,用半个世纪的坚守,让海防团的抗战传奇从沿海滩涂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八十年沧海桑田,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木帆船到航母编队的壮阔征程中,始终跃动着同样的精神密码:那是海防团战士们劈波斩浪的勇毅,是何家灶村民守护红色根脉的执着,同样也是“顾瑞芳们”发掘历史真相的坚守。

当我们再次凝视这张泛黄的合影,分明看见一种精神正在破浪前行——它化作航母甲板上的晨曦、化作护航编队劈开的浪花,在新时代永远闪耀……

·施菊 王颖·



1944年春,陶勇(左三)与吕四海战凯旋的海防纵队团以上干部合影。